

失败的帝国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著
Vladislav M.Zubok

李晓江 译

版编目(CIP)数据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 (美) 祖博克
(Zubok, V. M.) 著；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

ISBN 978 - 7 - 5097 - 5785 - 7

I. ①失… II. ①祖… ②李… III. ①苏联解体 –
研究 IV. ①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416 号

失败的帝国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介慧萍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阳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33

开 本 / 787mm×1092mm 1/20

插图印张 / 0.8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458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785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835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

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

本书所获赞誉

“这是一本既适合专家也适合有着广泛兴趣的人阅读的书……它应该会重新激发起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严肃讨论。”

——历史图书俱乐部 (History Book Club)

“这本书中发人深思的描述也许是迄今为止有关冷战中苏联一方写得最为全面和扣人心弦的。”

——《弗吉尼亚评论季刊》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祖博克的书确立了用来衡量未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标杆。”

——长谷川毅 (Tsuyoshi Hasegawa), 《外交与国际关系史圆桌评论》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这是从苏联一方解读冷战的最好的历史书。祖博克的分析远不止是一种概要性的叙述，而是以最前沿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他利用了最新获得的原始资料并对它们作了极其敏锐的解读。”

——威廉·陶布曼 (William Taubman), 安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本书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出色的概述，并围绕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与误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有力的解释。”

——文安立（O. A. Westad），《全球冷战》的作者

“（这是）一部有关苏联冷战期间对外政策史的著作，文献极为翔实，对克里姆林宫的关键决策者的动机的揭示发人深省……凡对冷战或1945年后的欧洲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欧亚研究》（*Europe - Asia Studies*）

“叙述流畅而可信。”

——《国际关系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这本书）对苏联兴亡作了饶有兴味的和真正富有洞见的研究……对于理解苏联史以及整个20世纪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哈珀新闻（*WHRW News*）

“（这本书是）对长期被西方中心论的分析所占据的领域的重大贡献……值得大力推荐”

——《选择》（*CHOICE*）

“在通过新获得的原始资料重估苏联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当中，祖博克显得特别重要……[《失败的帝国》]把故事扩展到冷战结束，并对整个这段时期作了精彩的概述。”

——《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它）利用了新的重要的原始资料，但也为影响双方政策形成的因素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径。”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它）属于有关苏联的冷战问题的新的权威性作品——对学者和学生来说都是如此……（它）将新与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对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又为重构政策背后的那些因素提供了鲜活的新材料……这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独树一帜。”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献给我的父母
马丁和柳德米拉·祖博克

中文版序

拙著得以译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字并与中国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董风云编辑。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金融强国，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责任、义务和挑战，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因此而变得与认识国家的历史一样重要。单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觉得，《失败的帝国》既有趣又有用。他们可以获得的不仅是些事实，对中国不久前的过去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些解释，以说明苏联过去为什么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

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

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

英文版序（一）^{*}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①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

* 本序言是作者为英文平装本所撰序言。——编者注

① triumphalism，它并非是指某种具体的学说，而是指一种态度或信念，认为某一特定的观念、宗教或社会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因而应该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译者注

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 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 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1]2004 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 1992 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 1 000 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

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 $2/5$ 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

- xi 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

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2]

说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3]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4]1999 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

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 1974 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 ~ 1999 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5] 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6] 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

xiii 当然，俄罗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疏远“新”欧洲及美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俄罗斯的

政治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声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新”俄罗斯与北约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99年，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北约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结果，轰炸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然而，俄罗斯人将此举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而该国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盟友。俄罗斯政府是把轰炸行动当作“北约侵略”来对待的。在俄罗斯媒体上，亲西方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欧洲发号施令并无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让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觉得受到了侮辱。叶利钦想在解决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尝试，只能暴露出俄罗斯的无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在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建立“欧洲大家庭”的承诺，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俄罗斯人——不仅是官员，还有广大民众——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西方不想让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体面的位置。^[7]

在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这些趋势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之后，普京总统立即主动表示要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为打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俄罗斯的精英们却认为，美国笑纳了俄罗斯人的帮助，却从未做出相应的回报。布什政府反而恢复了似乎已被冷战的终结埋葬了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由新保守主义观念支配的华盛顿还宣布发动圣战，要将民主传遍全球——首先从中东阿拉伯地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当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